

吐蕃時期敦煌的寫經人

高田時雄

大量的藏文寫經沒有流失到國外而是留在甘肅省內敦煌等地，這已是眾所週知的，但其全貌過去未能完全弄清¹。然而前年（2011年）秋天出版了大部頭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敍錄》²，稱之為學界盛事也毫不為過。該《敍錄》介紹了敦煌市博物館等甘肅省內的博物館、圖書館共12個單位以及一位私人藏家收藏的合計6672件的藏文寫卷的內容³，對這些寫卷，不但標注了用紙的種類、裝幀方式、大小等，而且移錄了文獻的首題、尾題及題記的藏文，又進一步將其逐一翻譯成漢文。該書確屬劃時代的精心著作，在此想向從事編輯工作的各位先生表示深深的敬意。

文獻的內容幾乎全是《大般若經》⁴與《無量壽宗要經》⁵，無庸贅言，這是吐蕃末期在敦煌實施的寫經事業的產物。經典的文本本身千篇一律，並無特別的意義，但各寫卷的卷末所記的寫經人名與校經人名是解明這個寫經事業的實際情況的重要材料。

筆者幸蒙擔任《敍錄》主編的敦煌研究院的馬德氏惠贈一部，對《敍錄》中收錄的寫經、校經人名進行了初步整理，在此試論整理過程中注意到的若干問題。

一、寫經人名的漢字復原

¹黃文煥氏對此有一系列的介紹，遺憾的是還很難說已經反映了其全貌。同氏《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978年第12期，第59-63頁；《河西吐蕃經卷目錄跋》，《世界宗教研究》（第二集），1980年，第56-62頁；《河西吐蕃卷式寫經目錄跋後記》，《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1期（總第7期），第84-102頁。

²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16開本，892頁。以下簡稱《敍錄》。

³在《敍錄》出版之前，對各單位所藏的藏文寫卷的介紹是各自進行的。管見所及有以下論著。王南南、黃維忠《甘肅省博物館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敍錄（上）》，《中國藏學》2003年第4期，第68-82頁；傅立誠、楊俊《敦煌市博物館藏古藏文《大乘無量壽經》目錄（一）》，《敦煌學輯刊》2004年第2期（總第46期），第41-58頁；同（二），《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3期（總第49期），第53-70頁。此外，《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設有同名的“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敍錄”專欄，公佈了馬德《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概述》，張延清、梁旭澍、勘措吉、郭俊葉《敦煌研究院藏敦煌古藏文寫經敍錄》，俄軍《甘肅省博物館藏敦煌藏文文獻補錄》，勘措吉、黎大祥《武威市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寫本》，孫宏武、寇克紅《張掖甘州區、高臺縣兩博物館藏敦煌藏文《大乘無量壽經》簡介》，張耀中《酒泉博物館古藏文《大乘無量壽經》敍錄》，邵惠莉、范軍澍《蘭山范氏藏敦煌寫經目錄》。

⁴藏文直譯為《十萬頌般若波羅蜜經》（She-rab-kyi-pha-rol-du-phyin-pa stong-phrag-brgya-pa），小文稱之為《大般若》。

⁵藏文是 Tshe dpag-du-myed-pa zhes-bya-ba theg-pa chen-po'i mdo.

藏文《大般若經》、《無量壽宗要經》中以藏文記錄了寫經人、校經人的人名。寫經事業動員了敦煌的許多漢人居民，其人名雖被轉寫為藏文，當然還是漢人的人名，應可準確復原為漢字，實際上也最好加以復原。但遺憾的是，《敍錄》的許多復原是不正確的，恐怕會產生不少誤解。要將這些藏文轉寫的人名準確地復原為漢字，需要根據當時敦煌所用的漢字音，該書顯然未採取這種嚴密的方法而是無原則地將其改寫為漢字，導致有此失誤。

例如關於姓氏，Cang=張、Wang=王、Khang=康、Sag=索、Li=李、”An=安、”Im=陰、Bam=汜、Do=杜、Song=宋、Leng ho=令狐、Meg le=墨離等都已準確復原為漢姓，完全沒有問題。

然而 Jin=金、Lu=陸、Ye’u=佑、Zhim=辛、Ge’u=苟、’Go=高、Sheg=謝、Ha=哈、Beg=瓦、She’u=猴、Bung=王、Beng=王、So=索等，均需訂正如下。

Jin = 金→陳
Lu = 陸→廬
Ye’u = 佑→游
Zhim = 辛→任
Ge’u = 苟→高
’Go = 高→吳
Sheg = 謝→石
Ha = 哈→何
Beg=瓦→白
She’u=猴→燒
Bung = 王→馮
Beng = 王→彭
So = 索→蘇

漢人的姓數量有限，而且就敦煌居民的姓氏而言，還可以進一步縮小範圍，因此應該比較容易進行推定，但實際上未必都已準確地復原為漢字。至於名的復原，可以設想其困難會大得多。例如《敍錄》將 Cang”i tse 定為“張議潮”，從對音上看是不可能的。或許這個人物應該復原為“張意子”，對此下文會再談到。

吐蕃時期敦煌通行的漢語依舊受到長安標準語的強烈影響，因此這些人名在音譯時用的是這種標準音。敦煌土著的所謂河西方言當亦同時通行，但該時期尚未出現在社會的表層。它是在進入歸義軍時期後逐漸在敦煌獲得標準語的地位，不久在用藏文書寫漢語時也使用這種字音，但吐蕃時期還未出現。試舉具體而典型的例子來看，宕攝字與梗攝字的鼻音韻尾在吐蕃時期尚未消失，例如“張”字是寫成Cang的，絕不會像河西方言那樣寫成Co。在漢字人名的復原方面首先需要注意

這個基礎方言的問題⁶。

在甘肅所藏的藏文寫卷中，寫經人、校經人的人名共出現了 4620 人次。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人名是像 Song g-yu legs 那樣的漢姓蕃名。對其名的部分也進行意譯而將該人名全用漢字表示寫作“宋玉善”雖然不是不可能，但將這種漢姓蕃名寫作宋 g-Yu legs，名的部分仍用藏文，可區別於漢名，從這個角度來看長處較多。但對姓名均是漢字音譯的情形，當然最好復原為原來的漢字。這樣纔能將吐蕃時期的寫經人名與漢文文書聯繫起來進行考證。換言之，像上舉的“張意子”的情形，可與漢文文書中出現的人名進行比較、推定，纔能確認藏文轉寫人名的漢字復原是否正確。

以下試舉幾個例子。

首先來看“張日興”。此人作為《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人，在《敍錄》中以 Cang zhir hing 的形式出現了三次。另一方面，吐蕃時期的漢文文書中是在 P.ch.3394 《大中六年(852)僧張月光，呂智通易地契》中出現的。張日興是該契約當事人的張月光之弟，作為保人列名，以藏文簽字（右圖）。關於大中六年，從時代上看雖已進入歸義軍時期，但有充分理由設想此人在吐蕃末期為寫經事業所動員，而且以藏文畫押的行為更容易使人想見他應是在寫經所工作過的人物。《敍錄》將其寫作“張席衡”是毫無根據的。



在《敍錄》中作為藏文《大般若》寫經生出現的 Jin 'Do tse 並非“金奴子”，而應是“陳奴子”。這個陳奴子見於 S.5824 《應經坊請供菜牒》。這是指向寫經人供應菜的文書，這種供應被定為由行人部落及絲棉部落負擔，其中絲棉部落負擔部分的人名中有陳奴子。因此該文書的人名均是從事寫經者，是藏文轉寫人名的漢字復原的重要參考資料。需要注意的是，在《應經坊請供菜牒》中，與陳奴子同列的還有“安和子”之名。據 S.5818 可知安和子在宴席中有猥褻言行而被要求加以處分，其中可見“寫番經判官安和子”的頭銜，表示安和子正是藏文經典的寫經人。可以確認陳奴子與安和子兩人作為同事都從事過寫經。

“An weng tse 作為藏文《大般若》寫經人共出現了十八次⁷。《敍錄》寫作“安旺財”，實際應是“安榮子”。其名見於漢文文書，在吐蕃時期的隊編制名簿 P.ch.3249 中的《將安榮子隊下貳拾陸人》中，作為率領二十六人的隊長出現的正是此人。

在《敍錄》中被寫作“張議潮”的 Cang 'i tse，如上所述應復原為“張意子”。Cang 'i tse 作為藏文《大般若》及《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人，前者五見，後者一見，無疑就是在 P.ch.P2837 背面的《辰年施入疏》中寫明“二月八日弟子張意子謹疏”的施入餽籬五扇的張意子。

⁶詳見高田時雄《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東京：創文社，1988年）。

⁷僅寫 Wengtse（榮子）之名的例子尚有 16 個，如是相同人物則合計多達 34 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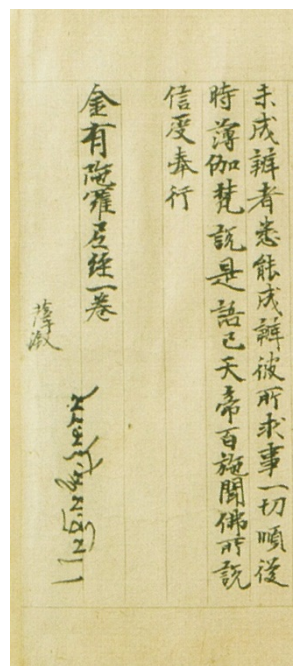
Bam cu cu 作為藏文《大般若》的寫經人一共四見。此人當是見於 S.3287 背《子年五月左二將百姓汜履倩等戶口狀》的“汜住住”。《敍錄》寫作“汜君君”，有誤。

儘管如此，《敍錄》中準確復原的情形當然也有，例如作為藏文《大般若》的寫經人出現三次的 Li lug lug 無疑是“李六六”。此人之名見於 S.2228 《亥年修城夫丁使役簿》，因此是吐蕃時期的敦煌居民。

此外，“王金剛”（Wang kim kang）在《敍錄》中作為《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人兩次出現，已被正確地復原為“王金剛”。P.ch.5003 《社司轉帖》、同號《社人納色物》、P.ch.5016 《社司轉帖》可見其名。這些文書沒有年號，根據見於同一文書的其他人名來看，其為吐蕃時期的文書是無可置疑的。

以上僅舉幾個例子來談，在進行寫經人名的漢字復原時，以當時字音的對應關係為根據，同時考察其人是否見於吐蕃時期的漢文文書，這是關鍵所在。不過根據這個條件，未必能將所有藏文轉寫的人名都準確地復原為漢字。如果不能復原，為免產生誤解，最好不要無原則地將其轉化為漢字。

關於吐蕃時期敦煌經常出現的漢姓蕃名，上文已舉 Song（宋）g-yu legs 為例，這些人是通常僅用蕃名而無漢名，抑或也有漢名，因時期與場合不同而分別使用？對此問題不容易做出明確的解答，筆者傾向於後者，認為漢名蕃名兩者兼有的可能性較大⁸。這是因為杏雨書屋所藏的羽 191 號寫本《金有陀羅尼經》的末尾作為寫經人以藏文 Ser mdo skyes bris（薛 mdo skye 寫）署名的人，同時以漢字寫作“薛澈”，可知這個薛姓的人物既有“澈”的漢名又有 mdo skye 的藏名（右圖）。順便提一下，mdo skye 直譯為漢語就是“經生”。



二、見於《敍錄》寫經人與校經人

上文已經談到，吐蕃時期寫經事業的主要對象是《大般若》與《無量壽宗要經》。迄今為止，關於後者的《無量壽宗要經》，對其寫經人及校經人已有比較詳細的整理與研究⁹，至於《大般若》似乎尚未有過系統的研究。筆者想在今後做進一步的研究，

⁸這種情形類似於現代的香港人與海外華人在原來的漢名之外另有英文名字。在這個問題上從古至今沒有太大差別是饒有興味的。

⁹上揭注(1)所舉的黃文煥氏的介紹之後，日本有西岡祖秀《ペリオ蒐集チベット文『無量壽宗要經』の寫經生・校勘者一覽》，《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3-1（1984），同《沙洲における寫經事業——チベット文『無量壽宗要經』の寫經を中心として》，《講座敦煌 6・敦煌胡語文獻》（1985），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90）中有「『無量壽宗要經』の大量書寫」的部分（第 440-452 頁），關於俄國所藏《無量壽宗要經》還有 Л.С.Савицкий, Описание Тибетских свитков из Дунхуан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1。

作為其準備工作對見於《敍錄》的兩經的寫經人與校經人試作統計性的整理，其結果是明確了以下的事實。

從《大般若》來看，比較後揭的表一與表二可知，寫經與校經通常是由不同的人來負責的，至少出現次數較多的人物中未見兩者都承擔的情形。但有同一人物進行寫經與校對的情形，是個例外。敦煌市博物館所藏的《大般若》Db.t.6127，卷末記有Shin cheg gis bris ste zhus, yang zhu, sum zhus“神寂(?)抄寫，校對，二校，三校”，因此有時是可能出現這種情形的。這種事例在《無量壽宗要經》中也可觀察到¹⁰，但恐怕不能看作正規的方式，尤其是《大般若》給人以書寫與校對的分工更加明確的印象。

根據迄今為止的研究，我們知道《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動員了大量的漢人，從表三的出現次數上位的過半數是包括漢姓蕃名者在內的漢人這一點，也可確認這個事實。試將其與表一的《大般若》寫經人作一比較，就可知道漢人的比率比《無量壽宗要經》更高，除了首位的Jam dpal（文殊）之外全是漢人¹¹。《無量壽宗要經》中的盧再興、張什德、康德德等姓名均用漢語，《大般若》與此不同，基本上是漢姓蕃名，這一點是耐人尋味的。關於與《無量壽宗要經》不同的《大般若》書寫，或許有某種限制。再者，根據名字來推斷，可知《大般若》的校對似乎通常是由僧侶來負責的，可以認為其作業要求比《無量壽宗要經》更加嚴格。

其次希望比較一下表一與表三。關於《大般若》與《無量壽宗要經》的寫經，可知其寫經人未有重複出現者。當然這是就出現次數較多的人名而言，實際上兩經的寫經均參加過的人雖然相當多，卻僅佔整體的一成到二成左右，最多不過二成左右。這個現象起因於時間上的差距，抑或作業性質的不同，由於牽涉到寫經所的編制問題，今後需作進一步的檢討。

以上是受到《敍錄》出版的啟發，就吐蕃時期敦煌的寫經人的漢字復原問題談了若干意見，並揭示同時使用漢文文書探討從事寫經、校經人物的實際情形的可能性。而根據數據還明確了同是寫經但《大般若》與《無量壽宗要經》有相當多的不同。希望能對今後的研究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當然，為了進行真正的研究，不僅限於甘肅藏的寫卷，還需要將散見於世界各國的所有材料匯集起來進行綜合的判斷，這是自不待言的。筆者也多少做了準備，此次因受時間限制，未能充分加以檢討，希望近期有機會另稿論述。

¹⁰上山大峻上揭書，第442頁。

¹¹不過Jam dpal（文殊）不見得就是藏人，也完全有可能是漢人。

表一：《大般若》寫經人出現次數

Jam dpal (文殊)	70
Cang rma legs 張	31
Song g-yu legs 宋	30
Do stag cung 杜	21
Dang g-yu legs 唐	20
Leng ho lha skyes 令狐	19
”An weng tse (tshe) 安	18
’Go stag cung 吳	18
La stag tse 羅	17
Sag gung legs 索	17
Cang legs rma 張	16
Weng tse 榮子	16
Cang dge brtan 張	15
”Im gtsug legs 陰	15
Sag dge legs 索	15
Wang stag zigs 王	15
Den stag legs 田	14
”An g-yug zigs 安	13
Khang dpal legs 康	13
Sag khri legs 索	12
Son shin 'do 孫神奴	12
Cang brtan legs 張	11
Tsyang legs 'dus 蔣	11
Deng dpa' 'dus 鄧	10
Khang btsan slebs 康	10
Sag lha bzher 索	10
Wang klu legs 王	10
Wang stag cung 王	10

(注) 對於漢姓蕃名，僅以漢字表示其漢姓。

Wengtse 榮子很可能與“安榮子”是同一人，或許應該合併。

表二：《大般若》校經人出現次數

Zhim chog (寂勝)	108
Sengge sgra (獅子吼)	83
lha legs (天善)	77
’phan legs (益善)	77
byang chub (菩提)	73
Phug ’gi 福義	59
Phab ting 法燈	58
Dgem chog (最勝)	55
Dze cin 再珍?	54
Dge brtan (善堅)	51
Sha ri bu (舍利弗)	49
Ci sun 智□	47
Dge legs (妙善)	47
Dpal gyis gron ma (吉祥燈)	47
Leng ce’u 靈照	45
Phab dzang 法藏	45
Legs ’dus (善眾)	40
Rdo rje (金剛)	39
Bun shu 文殊	38
Yon tan (功德)	37
Dam tshong 談聰?	34
Ci dzeng 智淨	33
Dam zhen 談善?	33
Hwe ’gog 惠□	33
Chos grub (法成)	32
Khrom kong (?)	32
Ngang tshul (理趣)	31

(注) 括號內是藏文的意譯。音譯的漢名已復原為漢字，未能通過漢文文書進行確認者加上問號。

表三：《無量壽宗要經》寫經人出現次數

Lu tshe hing 盧再興	27
Cang shib tig 張什德	24
Khang tig tig 康德德	21
Ser thong thong 薛通通	21
Snyal stag snya	19
Gzangs lha sto	17
Jin lha bzher 陳	16
Lu ju ju 盧住住	15
Stag brtan	15
Cang snang legs 張	11
Phan phan	11
So hwa hwa 蘇和和	11
Brtan legs	10
Gu rib lhas btsa	10
Heng dze'u 恆照	10
Lha lod	10
'Go le'u le'u 吳老老	9
Khe rgad lha tse	9
Leng ho zhun tse 令狐順子	9
Mchims g-yu gzigs	9
Wang rma snang 王	9